



一份执著，一份眷恋；一种信念，一种姿态

纸上苍凉


 Thirty Years
 复旦大学出版社
 www.fudanpress.com.cn
 李辉◎著



Thirty Years

纸上苍凉

李辉◎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www.fudanpress.com.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纸上苍凉/李辉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 8
(“三十年集”系列丛书)
ISBN 978-7-309-06620-3

I. 纸… II. 李… III. 人文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7337 号

纸上苍凉

李 辉 著

出品人/贺圣遂 责任编辑/张 炼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江苏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9.5 字数 302 千

2010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6620-3/C·126

定价:34.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在历史追寻中行走



未曾想，转眼间自己居然也到了回顾三十年写作历程的年纪。

以往，追寻他人往事，考察文化演变，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半个世纪前，只是历史远景中的某一时间段落，与己无关，任由吾辈研究者解剖与归纳。然而，走进2009年，为复旦大学出版社编选此书时，忽然意识到，所谓二十年前、三十年前，也成了自己拥有的某一个具体时间段，需要来回顾，来审视，由不得回避。

毕竟年过半百。天命虽难知，记忆却清晰。

三十年前，在大学期间以研究现代文学起步，大学毕业后却当了记者，且二十多年一直没有离开报纸这个平台；写作虽侧重于传记和随笔，但最大兴趣却又在搜集与整理史料，近十年则将更多精力集中于美国《时代》周刊与中国现代史关系的叙述；编辑副刊多年，却又在二十多年时间里对策划图书出版乐此不疲，散文、传记、回忆录、书信、日记、档案等，体裁不一，参与编选与策划出版的图书，达二百余种，为此付出的时间与精力，似乎并不比写作少。主业到底是什么，自己也说不清楚。

什么都不像，却是我喜欢的人文状态。不囿于某一称谓，就能多一些伸展空间，多一些选择对象，多一些更为自由更为轻松的心态。未来该如何走，或者说如何发展，对于我都无须考虑。珍爱兴趣，做想做的，一旦做，就尽量去做好，如此而已。

于是，忐忑不安中，我加盟到“三十年集”丛书之中，与各位真正有专业、有体系、有深度的学者相伴而行。虽忐忑，却高兴。在我看来，重要的或许不在于作品本身，而在于我们是同龄人，专业不同，取向不同，却有回忆往事的同一时间段。相似与差异，正可以彼此参照与映衬，一个宽阔而复杂的人文背景，由此将得以呈现。

人文三十年——一个属于大家共同的记忆。

一、复旦起步，幼稚而兴奋

1978年春节期间，刚刚参加过高考的我，在家乡湖北省随县（今随州市）期待着录取通知书的到来。元宵节将近，一天我去打（当地话“打”即零买之意）酱油和醋。拎着空瓶子，走在街上，忽然迎面碰到我所工作的工厂——湖北油泵油嘴厂——负责招生的师傅，他喊道：“李辉，你的录取通知书来了。是复旦大学的。明天到我那里去取。”

半个月后，1978年2月，我走进了复旦校园。成了复旦大学中文系七七级文学专业的学生，我们班的信箱号为7711，这个数字，从此成了我们班级的代号；我的学号是7711026——它也是毕业证上的号码。

未来的三十年行程，在这个春天起步。

当时真正称得上是历史转折时刻。真理标准讨论、思想解放、平反冤假错案、改革开放，一个新时代，仿佛早在那里做好了准备，在我们刚刚进校后不久就拉开了帷幕。印象中，当时的复旦校园是一个偌大舞台，国家发生的一切，都在这里以自己的方式上演着令人兴奋、新奇的戏剧。观念变化之迅疾，新旧交替的内容之丰富，令人目不暇接，甚至连气都喘不过来。上党史课，一个星期前彭德怀还被说成是“反党集团”，一个星期后就传来为他平反昭雪的消息；关系融洽的同学，一夜之间，变成了竞选对手而各自拉起竞选班子；老师和学生在课堂上会因见解不同而针锋相对，难分高低；班上同学发表《伤痕》、《杜鹃啼归》，点燃了许多同学的文学梦……现在，有不少论者将“八十年代”界定为“新启蒙时代”。就其时代特性而言，准确地讲，1978、1979两年，与80年代应该是一个整体。除了“真理标准讨论”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外，这两年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如平反冤假错案，为地主、富农等阶层的子女摘帽，数以千万计的人拥有了平等的公民身份；重视知识，重视人才，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重新得到重视……一切都为80年代的行进做了最好的准备和铺垫。

我有幸在这样一个时代巨变的转折之际，从内地一个县城，从社会经验肤浅、见识狭窄、知识贫乏的旧我，走进了一个让人眼花缭乱、充满新奇与吸引力的校园，拥有了一个永远值得留恋的班级。

1978年秋天,一次我与同窗陈思和闲谈,我们发现双方都对巴金的作品有兴趣,遂产生合作研究巴金的念头。陈思和虽比我只大两岁,但在进校之前,他已在图书馆工作数年,且有文艺评论的写作经验,有理论深度,擅长思辨。而我,虽二十有一,但自儿时起从未接受过好的教育,在名著阅读、写作训练诸方面,尤其显得幼稚与肤浅。当时自己最大的本钱,不过是好奇、热情、大胆。我丝毫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先天性知识欠缺,竟然毫不迟疑地决定与他一起研究巴金——当时非常陌生、非常棘手的一个课题。

现在想来,把巴金确定为最初研究对象,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首先,巴金是“五四运动”的“产儿”,从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理论家和活跃分子,到成为著名的文学家、出版家,其丰富性、复杂性,值得系统研究。这促使我们一开始就必须尽可能把视野拓展,从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的多角度来阅读,来搜集资料,来加深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与理解。其次,巴金在经历“文革”磨难后,重新拿起笔,发表《随想录》文章,开始以反思历史与关注现实的特点与新时代同行,这为我们的关注与研究,提供了新的话题,使我们可以不限于故纸堆式的研究,而与现实有了直接关联。陈思和后来尝试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打通,提出“新文学整体观”的思路,并把当代文学创作也作为重要研究对象;我后来从巴金研究,延伸到撰写与他同时代的其他作家的传记,以及研究相关文化史的专题;各自取向虽不同,但我们的最初选择,有着必然联系和内在发展逻辑。

幸运的是,在刚刚确定合作研究巴金之际,我们便结识了贾植芳先生。贾先生在1955年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此时还未平反,但结束了在印刷厂的劳动,临时回到中文系资料室工作。

中文系在校园西南角一幢三层旧楼。楼房多年失修,木楼梯和地板走起来总是咯吱咯吱发响。楼道里光线昏暗,但走进资料室,并不宽敞的空间,却令人豁然开朗,仿佛另外一个天地。资料室分两部分,外面是阅览室,摆放着各种报纸杂志;里面则是一排排书架,书籍按照不同门类摆放。一天,我走进里面寻找图书,看到里面一个角落的书桌旁,坐着一个矮小精瘦小老头。有人喊他“贾老师”,有人喊他“贾先生”。我找到书,走到他的身边,与他打招呼,寒暄了几句,具体说了些什么,已记不清楚了。从那时起,我就喊他“贾先生”。后来,到资料室次数多了,与先生也渐渐熟悉起来。面前这个小老头,热情,开朗,健谈,与他在一起,没有任何精神负担和心理压力,相反感到非常亲切。每次去找书,他会与我多谈几

句。有一次,我正在资料室里找书,看到一位老先生走进来与他攀谈。他们感叹“文革”那些年日子过得不容易,感叹不少老熟人都不在人世了。那位老先生当时吟诵出一句诗:“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后来知道这是杜甫的诗句,写于安史之乱之后。

说实话,当时我对他们这样的对话,反应是迟钝的。更不知道先生此时刚刚从监督劳动的印刷厂回到中文系,历史罪名还压在他身上,对变化着的世界,他怀着且喜且忧的心情。我当时进校不久,虽已有二十一岁,但自小生活的环境、经历和知识结构,使得自己在走进这个转折中的时代时不免显得懵懂。许多历史冤案与悲剧,许多历史人物的是非曲直我并不知情。然而,不知情,也就没有丝毫精神负担,更没有待人接物时所必不可少的所谓谨慎与心机。我清晰记得,当时自己处在一种兴奋情绪中,用好奇眼光观望着一切,更多时候,不是靠经验或者知识来与新的环境接触,而是完全靠兴趣、直觉和性格。

我和陈思和渐渐成了贾先生家里的常客。

在贾先生家,喝得最多的是黄酒,吃得最多的是炸酱面。后来,还是喝酒,还是吃面。听得最多的则是动荡时代中他和师母任敏的坎坷经历,以及文坛各种人物的悲欢离合、是非恩怨。他讲述文坛掌故与作家背景,关于现代历史与文学的广博见识和真知灼见,时常就贯穿于类似的闲谈中。他所描述的一个远去的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五光十色的人物,引起我浓厚的兴趣。将近三十年过去,这种兴趣依然未减,首先归于贾先生的熏陶,是他为我开启了走进历史深处的大门。

与课堂教学相比,我更喜欢这种无拘无束、坦率的聊天。在我看来,这甚至是大学教育真正的精华与魅力所在。一位名师,著书立说固然重要,更在于用一种精神感染学生,用学识诱导学生。在我眼里,贾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名师。他教育我们:走学术之路首先要学会搜集资料、整理资料;研究作家必须读最早的作品版本;不要人云亦云,要有独立思考。他总是说,做人比什么都重要,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人格不能卑微,要写好一个“人”字。许多年后,经历风风雨雨之后,我才更加深切地体会到这些教诲的重要性。

不久,贾先生邀请我们一同参加他主持的《巴金研究资料汇编》项目的工作。这是搜集资料、整理资料的基本功训练,我们眼前,一个新的天地顿时跳跃而出。

1979年年底,我和陈思和写出了第一篇论文《怎样认识巴金早期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贾先生帮我们寄给了《文学评论》的王信先生,后经过陈骏涛先生之手,

刊发在1980年的《文学评论》杂志上。文章虽改成通信形式,但观点基本保留。我们当时还只是大学三年级学生,文章能在学术界权威刊物上发表,可以想见我们的兴奋。

我们合作研究巴金,从大学期间一直延续到毕业之后的1984年,前后达六年。最初的研究成果结集为《巴金论稿》,198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们俩第一次出版著作。不能说最初的研究成果是出色的,但是客观地说,最初迈出的步履是认真而踏实的。为了第一本书的诞生,我们付出了全部心血,在此过程中,得到了搜集资料、文本校勘、论文写作、理论分析等多方面的基本功训练。同时,最初的学术研究对象的选择,成为日后不可缺少的文化背景、思想背景。

三十年,漫长,复杂,却也单纯。

二、记者的角色,记者的笔

1982年年初,大学毕业后我离开上海,到《北京晚报》成了一名记者。

初到北京时,我怀揣着贾先生写的几封信。他说我一个人独自来京,诸多不便,故介绍我去看望胡风、梅志夫妇等一些他的亲朋好友。他虽不在身边,依然热心呵护我,引导我前行。在随后几年的来信中,他以自己的人生经验不断给我以教诲。他劝我一定要坚持学好外语:“千万不能放弃外文功夫。”(1982年7月14日)他不止一次在信中开导我要借从事新闻工作的机会了解社会,认识历史:“你还年轻,在新闻界工作,接触的面较广,藉此也可以多积累一些生活经验,了解中国社会现实,那对做学问是大有裨益的。”(1982年12月7日)

开始几年,我是当文艺记者。一段时间里,晚报文体组只有两名文艺记者,一是过士行先生——后来以剧作家著称,创作了《鸟人》等话剧,负责话剧、戏曲、曲艺、杂技;一是我,负责文学、影视、音乐、舞蹈、美术等。当时尚无“娱乐记者”之说,更无娱乐专版,而是文、体新闻每日共同一个版。我得感谢这一安排,它让我能够很快熟悉北京这座城市,熟悉文艺界的人与事。

我很快进入了角色,每天在电影院、剧院、会场跑来跑去。如果不是当年的采访本帮忙,我真记不得这一年到底看了多少电影,听了多少音乐会,看了多少展览。好在刚刚二十六岁,又未成家,一个人住在集体宿舍,有的是时间和精力,也

就全身心拥抱新的刺激了。

文体组记者少,版面却每日都有,这就给我这个新手提供了一个大舞台。只要你不闲着想,只要你愿意写,几乎都有见报的可能。记得有一天从头版到文体版,居然同时发表了我写的通讯、消息四篇。

这一年的六月,我接到毕矣午先生从武汉大学写来的一封信。毕先生是20世纪30年代诗人,曾与巴金的三哥李尧林、诗人何其芳同在天津南开中学当过教员。我在大学期间经贾先生介绍与他相识,每次回湖北都会去看望他。毕先生来信写道:

李辉同志:

信接到。我们都很惦记你。常读到你在报纸上写的简明而有文采的报导。师母每天读报时总是先找晚报上你写的文章看。在北京我的一些老朋友中有三十年代就写报告文学的人,知名的有萧乾。我初学写诗文时他是《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同我很好。他是斯诺的学生,也是巴金的朋友,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他的旧作最近重印了好几部。我最近收到他寄来的一本《栗子》。他英语很好,口语流利并有英文著作。他常出国访问。在北京遇到时可提一下,或可得到他一些指导。你既写文学艺术方面报导多,这样是否可以结合实际工作再多读一点文艺理论方面的书,从技巧研究到流派思潮到作家评传。有时间还可写较大一点的文章,如罗曼·罗兰写的《米开朗琪罗》、《贝多芬》那样的论著。这是我一点粗浅的设想,你当然比我想更切实更有规模一些。贾老师任敏老师处我久未写,也很想念他们。

专祝

进步。望有暇时写信。

矣午

六月廿五日

三十年后,重读毕先生的信,我发现,后来我所选择的写作方式与题材领域,实际上与他最初的建议相吻合。

由于做记者,时间与写作显得零碎而人难以沉静下来,加之个人也缺乏理论修养和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在大学开始的文学研究与论文写作,最终未能继续下去。此时,晚报副刊同事辛述威先生调至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我去看他,他鼓动

我选一个熟悉的人物写一本传记。我挑选了萧乾——他是巴金的朋友，又是沈从文的弟子，30年代“京派文人”中的重要一员；他是文学家、翻译家，还是著名记者和副刊编辑。他的丰富一生，对我很有吸引力，特别是二战期间在欧洲担任战地记者的传奇经历，尤其让我兴趣浓厚。为他写传，既可以拓展我的视野，又可以使我在忙碌与琐碎的工作中，找到相对适合我的性格和新闻特性的写作方式。于是，我转向了传记文学写作。80年代中期，除《浪迹天涯——萧乾传》之外，我又撰写了另一位新闻界前辈刘尊棋先生的传记《监狱阴影下的人生》。这两本传记的创作，是新的尝试，也是为后来的写作积累经验。

在80年代后期，对于我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付出心血最大的，无疑是《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一书的写作。

早在复旦大学与贾先生交往的过程中，我就陆续认识了他的一些友人。这些曾被描绘为“青面獠牙”的文人，在我眼里却是那么亲切、可爱。他们性格各异，文学成就不一，在命运折磨面前的表现也互有差异。他们是历史漩涡中一片片落叶，被抛起又摔下，落叶上，记录着历史的季节替换。

1984年，做记者的我，萌生了搜集和记录胡风集团冤案过程的念头。当时，胡风集团的平反还不彻底，许多话题在报章上甚至还是禁区。我只是本能地觉得，应该趁许多当事人健在的时候，尽量进行采访，留下第一手的口述实录，为后人的研究留下一些资料。我把这一设想写信告诉了贾先生，他当即来信，从更宽广的历史角度启发我。他在信中说：

你着手就一九五五年胡案编一本系统性的材料，我觉得倒是一个值得下点工夫整理的课题。……因此你这个设想还值得努力。国外，也注意到这个题目，因为它的历史意义不同寻常，就当代文学论争范围来说，它是“极左”路线的一个起点，也是文艺界受灾难的开端，不仅对我国的文艺界创痛深远，而且在政治上后果最重，影响深远。明朝的东林党事件后（这也可称之为东林事件的新版），曾在清朝出现过两本书《东林始末》、《东林事件》，它的体例，值得参照。我曾想了一个饶有兴趣的书名《胡儒学案》，因为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宋儒学案》、《明儒学案》一类书名的书籍，都是记述一代士林的，换言之，此类体例的文献资料书，在我国也算古已有之。我希望趁现在这些人还多半活着，业余不妨即行动手进行，当然它的付印出版，恐怕不能期之最近，其中

原因,不说自明。(1984年11月17日)

贾先生启发了我,促使我走进了追寻历史的大门。四年之后,编一本资料集的想法有了改变,转而创作了一部三十余万字的长篇历史纪实,即1988年10月发表于《百花洲》第五期的《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

研究中国现当代史,不难发现,由于中国的文学和政治的密切纠缠,使得文人之间、文人和政治之间的起伏、交叉、纠缠关系,有相当大的理解难度。特别是胡风集团冤案,牵扯到文艺界的宗派主义、毛泽东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历次政治运动的相互影响……远非一个单一角度或单一层面能梳理清楚。我为此感到困惑。复杂性如何理解,如何描述?譬如,我本人和贾先生的师生关系,是否会影响到我对胡风集团事件相关人与事作出客观、冷静的描述?写作过程中,想法渐趋明确,写胡风集团冤案的全过程,不能简单地为受害者辩诬叫屈——当然应该为受害者求得历史的公正——更重要的,应该把历史漩涡中内在的东西,如,权力与自由精神、宗派与宗派主义、个人崇拜与集体疯狂、人性与兽性、清醒与懵懂……尽量客观地呈现出来。我并未做到这些,但我却试图这么去做。

《文坛悲歌》杀青,其时正好是我将迎来三十二岁生日,我在后记中坦承,自己无法做到深刻,但却愿意当好一名“记者”。我写道:

写这本书,我越来越感觉到与其说自己是一个作者,不如说是一个“记者”——名副其实的记者。从全书来看,所尽到的责任和完成的任务,无非是在记,记当事人的谈话,记从报章上抄下来的文字,记侥幸地从不同的角度获得的第一手资料。除此之外,我还做了些什么呢?没有精心设置的结构,基本上是按时间发展顺序平铺直叙;没有深刻而酣畅的议论,仅仅在事实的叙述中间或流露几句感叹;没有生动的场景描绘和心理剖析,一切都让位于也许是枯燥的、直截了当的叙述。一个作者应有的主观色彩,只是淡淡地残留在字里行间。

形成这样的定局,或许是自己认为,比起书中几十位人物二十多年坎坷的命运,一切精美的文字也会显得苍白。批判、被捕、狱中、受难的妻子、受株连的人……每当想到这些,我都会被上述观点所左右,于是,最后出现的便是一个“记者”的书,而不是“作者”的书。

如今,再看当年作品,我觉得以“记者”身份来追寻历史、记录历史,其实是一

个明智选择。随着更多史料的发现,随着每个研究者思想深度的不同,对于历史事件的论述必然会有所变化并逐步深入。近些年来,关于胡风以及胡风集团冤案的回忆录、研究专著已出版多种,它们在史实提供、理论分析、历史思考诸方面,其丰富性、准确性和深度,远非拙著所能企及。但我所亲历的事件过程,所采访到的当事人的口述,却无法重现。我为自己以“记者”之笔而成为较早的历史叙说者感到自豪。

将近三十年过去,我所采访过的、熟悉的一些前辈,相继辞世,我永远怀念他们:胡风、梅志、路翎、贾植芳、任敏、鲁藜、曾卓、罗洛、王戎、王元化、耿庸、彭燕郊……

刚完成《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我一度雄心勃勃,计划接着再写两本书:《一九五七年的文坛》与《“文革”中的文坛》,以构成“当代文坛三部曲”。我还计划写一周扬传。可惜,这些构想最终未能完成。现实环境与个人写作心境的变化,历史头绪的繁复与相关史料搜寻的困难,评判当代政治、文化史的诸多局限,种种因素将人制约。历史与现实的重负下,我脆弱而苍白。我深知没有能力和魄力,来驾驭如此重大的题材。

我至今仍觉得周扬是一个值得花大力气研究的重要对象。在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界,周扬是跨越时代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自30年代初与鲁迅发生矛盾,发展到后来对胡风、冯雪峰、丁玲的打压,周扬的宗派主义贯穿了中国长达数十年的左翼文艺运动。与此同时,他自己的思想演变脉络与历史变革密切相关,左联时期—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1949年至“文革”爆发前十七年—“文革”结束后讨论人道主义异化问题时期……在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由于个人地位、身份的特殊原因,周扬身上表现出的复杂性、特殊性,在思想文化界可能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与之相比,作为研究对象,他有着沉甸甸的历史分量。

基于这一考虑,尽管90年代初没有完成周扬传,但我采写并整理出一本《是非非说周扬》,也算是对自己的一个安慰。因为这毕竟是与《文坛悲歌》的一个自然衔接。当时想到,既然暂时无力系统而深入地描写周扬,还不如借用国外“口述实录”的形式,采访与周扬不同关联的人。我先后采访夏衍、林默涵、梅志、贾植芳、陈明、曾卓、温济泽、王若水、于光远、李之珪、王元化、贺敬之、华君武、袁鹰、龚育之、顾骧等数十人,他们中间,或是与周扬亲近的友人,或是他的家人,或是他的同事,或是受到过他的打击的受害者……关系不同,视角不同,细节不同,甚至同

一事件同一场面的叙述,因为每人的亲疏不同而有差异。现在看来,采取“口述实录”虽然不是我最愿意采用的写作方式,但却有其意外收获,因为多角度的个人叙述,正可以避免先入为主,避免单一性叙述,从而能立体地多角度地凸显出周扬的复杂性,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更大的认识空间和思考空间。

由此来看,在叙述历史的过程中,当好“记者”角色,用好“记者”之笔,无论何时何地,都有其特殊作用和价值。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为自己在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新闻工作而感到满足与高兴。

三、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我常说自己是运气很好的人,常能在人生关键时刻遇到文化界前辈的指点与帮助。在大学,我遇到了贾植芳先生,他深深影响了我的研究与人生。而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对我的文学写作影响最大的是萧乾先生。

萧乾先生是新闻界、文学界的前辈,编辑副刊的高手,我到北京后,他既是我的采访对象,又是我的作者,80 年代他的几个重要系列文章,如《北京城杂忆》、《“文革”杂忆》、《欧战杂忆》,都是交由我在《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发表。1987 年我调到《人民日报》“大地”副刊后,他依然不断赐稿,一直到 1999 年去世。《萧乾传》则是我创作的第一本传记,他还推荐与介绍我去写新闻界老前辈刘尊棋的传记,鼓励我去写吴祖光、新风霞夫妇……

萧乾写给我的信近二百封,每次翻阅它们,都让我重温往事,感受温暖。这些信,记录了他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对我的关爱和帮助。从传授写作技巧、词语修饰,到推荐写作对象、针砭时弊;从指点行事风格、交际方式,到关心婚姻、评论作品……有批评,有误会,有开导,人生遇到的方方面面,他几乎都在信中写到了。一次,我寄去一篇文章请他看。他回信说:“短文读了,也做了些改动。你很会抓题材,写起来也能抓到要点。文字还可以再考究些。首先语法上要顺,其次,句子组织的不宜过松散。我是很在乎标点符号的——学过外文的人,一般这方面较严格。我改了不少你的标点。……”(1987 年 7 月 18 日)

最令人难忘的,是他在 1989 年鼓励我,鞭策我,使我得以继续以文化方式追寻历史。记得那一年,我一度感到郁闷、困惑与迷惘,心情极其糟糕,几个月写不

出一个字。得知我的精神状况，历尽沧桑的萧乾连续给我写来好几封长信，以他的亲身经历和人生感悟开导我。他希望我不要沉沦下去。他在信中说：“我强烈建议你此时此刻用具体、带强迫性工作，把自己镇定下来。什么叫修养？平时大家都一样，到一定时候，有人能坚持工作，有人心就散了。人，总应有点历史感，其中包括判定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心猿意马？我认为缰绳不可撒手。在大雾中，尤不可撒手。这几年你真努力，你应肯定自己的努力。要有个‘主心柱儿’，不因风吹草动就垮。”（1989年7月26日）一位前辈，能够如此推心置腹，读之岂能不为之感动而奋起？如果说自己这些年没有消沉，没有离开温馨的文化园地，萧乾在关键时刻的敲打，无疑起到重要作用。

那一年的秋天，我终于让自己沉静下来，开始一项与以往的写作完全不同的工作——校勘沈从文的传记作品《记丁玲女士》。启发、鼓动我做这一研究的，是作家、藏书家姜德明先生。

早在《北京晚报》时期，我因约稿而与姜先生结识。当时他已离开《人民日报》副刊而担任人民日报出版社社长，正是在他的鼓励下，我在写萧乾传的同时，围绕萧乾早期的著作《书评研究》编选了一本《书评面面观》，集中反映30年代中国书评理论与实践的状况，交由他出版。我1987年秋天调至人民日报社文艺部，恰好与他在同一栋办公楼工作。他在一楼，我在二楼，我有了更多向他讨教的机会。

1989年秋天，一次闲谈中，我与姜先生谈到了沈从文。他告诉我，沈从文抗战前后在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记丁玲》与《记丁玲（续）》，与先期发表于天津《国闻周报》的连载《记丁玲女士》相比，有不少删节。他说，年轻时他曾想找出来进行校勘，却因人总是处在社会动荡中而未能如愿，如今终于安静下来，年岁却大了，已无更多精力来做这种事情。他建议我，不妨花些气力与时间，做做这项工作。

人正在飘的感觉中，以校勘来磨炼性情，充实学识，确有必要。何况，因为研究巴金和萧乾的缘故，到北京后我就与沈从文有了接触，写过关于他的报道和评论，现在，从他的文本研究入手来深入认识他，应该说是一个有趣的课题。

十分运气，报社图书馆里正好藏有一整套30年代的《国闻周报》。我分别从唐弢先生和范用先生处借来《记丁玲》及续集两种，再借出《国闻周报》，一页又一页，一句又一句，对照着字句的细微变化。几个月时间里，我成了图书馆的常客。静静校勘中，我告别了1989年。静静校勘中，我看到了许多年前生动的历史场景，看到了两个著名作家个体生命在时代大变革之中发生的复杂变化，而这种变

化又折射出了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分化、矛盾甚至对立。

最终有一天,校勘诱发我开始追寻这两个作家的交往史。我试图借梳理六十年间他们由相识、相助、合作、友好到隔阂、淡漠、矛盾、反目的全过程,描述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苦闷、彷徨、奋斗、抗争乃至寂寞、磨难等。走出图书馆的我,又像过去一样,开始了四处访谈、通信求证的工作,最后完成了《恩怨沧桑——沈从文与丁玲》一书。

至今我仍然喜欢这个作品,不仅仅在于它帮助我完成了两个年代的替换,也在于它使我对写作形式的运用,有了新的认识与体验。就叙述风格而言,受其直接影响的,就是随后连续三年的“沧桑看云”系列文章的写作。

大约在1992年春天,《收获》的李小林女士约请我开设一个专栏,集中写“五四”时代之后的文化人物与文化事件。在此之前,我在《读书》上发表过《恩怨沧桑——沈从文与丁玲》中的部分章节,还为《收获》写过关于沈从文的《平和,或者不安分》、关于巴金的《云与火的景象》等散文,她喜欢这种人与事的叙述方法,鼓励我按照同样风格写一个系列。

我欣然答应。我喜欢“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句诗,这是一种个人与现实的生存状态,也是写作者与描写对象之间的历史呼应关系。基于此,我把栏目定名为“沧桑看云”。连续三年,十八篇“沧桑看云”,我选择郭沫若、梁思成、老舍、邓拓、吴晗、聂绀弩、姚文元、赵树理、胡风、瞿秋白等文化人物作为叙述对象。时值“文革”爆发三十年,对“文革”期间人物与事件的考察与叙述,成了我这三年写作的重点。因此,除相关人物外,我还特地选择红卫兵运动和“五七干校”作为叙述对象,力求从历史角度予以解读。

“沧桑看云”系列的写作,对自己的挑战是多方面的。

这是历史研究的挑战。一篇文章写一个人物,虽非完整的传记,却需要对其一生有较为系统与完整的把握,需要尽可能地择选出凸显其命运与性格的人生环节。这也是写作风格的挑战。为《收获》这一文学刊物写,就应与《读书》等文化类刊物有所不同。资料运用与文学渲染之间,两者关系如何处理,人物命运与历史场景如何相互映衬,都必须细加处理。写作时,我并没有考虑到底属于“学者散文”还是“作家散文”,我只想以浓缩的方式,挖掘所写对象的性格与时代的关系,假如人物命运的描述中能够漫溢出诗意,当然更好。

我一直看重史料在研究与写作中的作用。写《文坛悲歌》如此,写“沧桑看云”

时也如此。都说史料是死的,是枯燥的,然而,一旦它们与人物命运紧密相连,就不能不让人产生种种难以言说的感觉。茫茫然,这是悠悠岁月中的回望。如同伫立于秋风的日子,凝望飘然而下的落叶,你无法理清思绪,也无法准确地寻找到表述的语言,就在这样一种感觉中,历史烟云中许许多多的人与事,在我的面前呈现出它们的意义。

坦率地说,从事文学研究和历史研究的人,常常面临两难境地:一方面,我们必须仰仗研究对象的回忆,从中发现历史线索和研究话题;一方面,我们又必须警惕个人回忆中的有意或无意的过滤、拔高甚至编造。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研究的深入与个人年岁的增长,与回忆录相比,我更倾向于相信历史档案的价值。日记、书信、档案文献等史料,尽管在使用时也需要小心翼翼,详加分析,但这些材料毕竟能提供更多的历史信息。于是,自 90 年代以来,除了策划出版一系列回忆录之外,日记、书信、档案的整理出版,也成为我特别侧重的事情。因为在我看来,研究历史,需要一番认真细致的梳理。诚然,在历史研究中需要宏观描述和概念的归纳,但这一切都应该建立在大量的历史事实、细节之上,不然就会容易失之于片面、笼统,甚至虚假。在当代中国,正史撰述长期存在空白与片面,民间修史又十分欠缺,这就更需要我们大力搜集和整理更多的历史档案。

搜集史料,也有机缘巧合。在这方面,三十年间我的最大收获是意外发现杜高档案。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一次我从北京著名的潘家园旧书摊那里,淘到一大批中国戏剧家协会五六十年代的档案材料。材料是由当年专案组整理出来的,包括个人检讨、互相揭发、批判提纲和批判会议记录等,涉及周扬、田汉、吴祖光等不少文坛重要人物,以及 1964 年“文艺整风运动”等某些重要历史事件。特殊年代的遗物,对于研究历史,档案制度乃至各种特殊文体,显然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在这些材料中,最完整的是戏剧家杜高的个人档案,历史跨度十多年,始于 1955 年反胡风集团和肃反运动期间,历经反右及之后长达十二年的劳改生活,结束于 1969 年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并释放回家。几十万字的交代、揭发、外调、批判、总结、评语、结论等,构成了一个庞杂的世界。档案的完整让人惊奇。批判会上的领导人随意写下的小纸条,每年必填的表格,都原封不动地按时间顺序装订成册。

得到它们,可谓千载难逢,难怪有朋友说我挖到了一个“金矿”。杜高先生看到这些档案时,激动而难过。但他表现出严肃的态度和宽阔的襟怀,本着对历史

负责,对后人负责的精神,他和夫人同意并帮助我将之整理出版,题为《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这是独一无二的文本,要算三十年来我在史料搜集与整理方面最大的收获。

四、“历史就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1997年,我去看望翻译家董乐山先生,他向我推荐一本英文著作:美国作家、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彼得·兰德(Peter Rand)1995年出版的英文传记类作品《China Hands》(《中国通:美国记者在革命中的冒险与磨难》)。全书每章以一位或两位著名美国记者为主进行描写。他们中有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斯诺夫妇、史沫特莱,更有一些后来我们虽不大提及但当年却是叱咤风云的记者,如1927年中国大革命时期的瑞娜、30年代初白色恐怖时期的伊罗生、抗战期间的白修德、国共内战时期的史蒂芬等。围绕这些不同时期的主人公,该书展开全景式的历史场面描写,从孙中山、宋庆龄、斯大林、蒋介石、毛泽东到罗斯福、史迪威、马歇尔、陈纳德等,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重要人物与发生的重要事件,都在该书中得到呈现。

董先生说,这本书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学性,在传记写作、史学研究和文学叙述诸方面,都很出色,这样一本与中国有关的著作,值得介绍到中国。他说该书的内容肯定会引起我的兴趣,并建议我抽时间将它翻译出来,还慨然答应可以在翻译过程中帮助我。

在当代翻译家中,我非常敬重和钦佩董先生。他把翻译的选择,与对命运的感悟、对历史的关照紧密联系在一起。当他在“文革”之前决定动手翻译《第三帝国的兴亡》时,这种翻译与人生的关系便开始形成。从那时起,一直到他生前最后出版的几本译著《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奥威尔文集》、《苏格拉底的审判》,他所翻译的各种不同史著、回忆录、小说、理论著作,与他的所有书评和杂文,构成了一个整体,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当代中国所发挥的独特作用表现得美丽无比。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编辑副刊时我与他建立联系之后,我们的交往从来没有中断过。90年代,两家离得很近,我常常去看望他,或约稿,或请教英语翻译方面的问题,有段时间则是帮他整理回忆录。这一次,他的提议令我喜出望外。我相信他